

葉宋曼瑛 著

張人鳳

鄒振環 譯

從翰林到出版家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

商務印書館

K825.4

YSM/1

從翰林到出版家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

葉宋曼瑛

著

張人鳳

鄒振環

譯

0022427
商務印書館

EV11/02

從翰林到出版家——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

作 者——葉宋曼瑛
翻 譯 者——張人鳳 鄒振環
責任編輯——黃志明
出 版 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
印 刷 者——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版 次——1992年1月第1版
©1992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4158 7

目 錄

引 言	張元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1
第一章	早年在廣東和浙江的生活	11
第二章	初露頭角的改革者	15
	1892——1898年間一名年輕京官	
第三章	張元濟和百日維新	33
第四章	士紳改革家和立憲主義者	67
	1898——1911	
第五章	在商務印書館的頭十年	97
	股東、經理和編譯所所長	
	1901——1911	
第六章	新時代的舊學家	135
	1912——五四時期	
第七章	商務印書館監理	173
	二十年代	
第八章	動蕩年代	199
	1926—1937	
第九章	戰爭年代	239
	1937—1945	
第十章	從內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259
	1945—1959	
結 論		289
參考書目		298

引 言

張元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張元濟七十歲生日照

張元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張元濟的一生經歷了清王朝到現代中國，是這急劇巨變時代的傑出人物。他出生於晚清封閉的儒教社會，取得翰林後，步入了有聲望和有影響的士紳學者階層的最上層。在傳統的帝制下，他本應前程似錦，然而在十九世紀末，清王朝迅速走向衰敗。這時候，停滯不前的中國卻面對着一個擴張和富有侵略性的西方。十九世紀中葉，洋人對通商權利的要求和堅船利炮的政策，徹底粉碎了中國多少世紀來形成的國際關係上民族中心主義的觀念——一個中央王國不斷向四周臣屬的小國輻射其影響力。西方的堅船利炮完全摧毀了這個中世紀王國的帆船艦隊和步兵軍團，隨後便是和平條約。一旦中國有違這些條款時，馬上又是戰爭。

西方的突然出現，使中國呈現了危機，直接挑戰像張元濟這樣的人。張元濟屬於為中國提供大多數領導人和官吏的士紳階層。他們接受儒家學說的教育，因為只有當他們成為儒家經典的專家，才有希望通過走向官場的科舉考試。他們深信，只有通過自我修

養、恪守傳統道德並按照儒家哲學去對待他人或他國，中國才能繁榮昌盛並與鄰國和諧相處。他們的教育，還使他們推崇經學，鄙視商業和貿易活動。

但是，面對屢次失敗的嚴酷現實和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士紳學者不得不重估傳統的價值觀念，在危難的時刻，單純地認為他們的責任是修正國家的政策和重新評價道德觀，諸如梁啟超（1873—1929）、蔡元培（1867—1940）和嚴復（1866—1921）等人，史家已經作過了大量深入的研究。這些人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為他們是有遠見的儒家學者，儘管受過十分正統的教育，卻顯示了他們很强的適應性和令人驚嘆的改革能力。對他們生平和事業的研究，有助於更深刻地理解中國近代歷史。而他們卻是張元濟同時代的人物。

對張元濟生平和事業的研究，我不打算把重點放在探尋他生平的具體史實，而主要是闡明他的生平、經歷和事業怎樣反映出整個轉變的一代知識精英的獨特氣質。張元濟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驚愕和失望，在戊戌變法時的抱負和愛國奏摺，在慈禧政變之後的挫折和失敗，以及從政治上的明智的撤退並選擇了出版業為終身事業，他的種種事蹟都能加深我們對這一代知識精英的理解——從歷史傳統來看，他們是產生大多數中國領導人物的知識階層的中樞，這些博學而又處於特殊地位的人，又把自己看作中華民族的智慧和良心。張元濟同他的同輩生活在中國要面對來自西方帝國主義史無前例的挑戰的嚴重時期。從某種意義來說，中國如何對付這些挑戰，大部份取決於精英的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思潮。國家大小官吏都來自這個階層，絕大部份能左右公眾輿論的辯士，歷代皇

帝的謀士多數也來自這羣士紳。可以毫無誇張地說，士紳階層的共同影響力，是決定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處於任何民族危機時可能採取甚麼態度的最有力的因素。通過對這階層中個別成員生平和事業的考據研究，可以對這種共同影響力的本質和份量有更充分的理解。因此，這本張元濟研究論著不僅是一位成為成功的現代企業家的傑出儒家學者的傳記，而且也是一份危難時期開明知識份子非凡的適應力及局限性的實例研究。

雖然這些知識士紳的精英分子的重要性是衆所周知的，但大部份的歷史研究都着重於政治活動者和激進分子，他們多數以反傳統思想或革命行動知名，至於像張元濟這樣並不太引人注目也不處於政治進程第一線的人物，卻言之甚少。例如，對康有為（1858—1927）和章炳麟（1868—1936）的研究，主要是因為他們分別替變法或革命作辯解，重新解釋孔子學說。儘管不可否認，他們是思想家，在形成新的思潮中是引人注目的，然而過於強調他們的重要性也是不明智的。畢竟，我們很難衡量這些雄辯、有說服力的學說對歷史進程有多大的影響。至於譚嗣同（1865—1898）或孫中山（1866—1925），由於在他們的時代裏起過引人注目的作用，而使他們的活動得到了應有的讚頌。但同時，他們的活動也激起了我們的想象：他們對歷史的功績不能掩蓋其他不太突出的歷史人物的品格和輔助作用。如果我們只把焦點集中康有為和譚嗣同，能否正確理解戊戌變法？如果僅僅研究孫中山和章炳麟，又能否清楚知道辛亥革命的複雜性？

實際上，像張元濟那樣的人，才是士紳階層的佼佼者。他從未參予激進的先鋒隊伍，沒有宣揚新哲學，也沒有對中國文

化作過革命性的解釋，更沒有興趣採用激進的政治方式把中國強盛起來。事實上，他對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問題是採取傳統的方式。在漫長的一生中，縱使政局常常變化和社會動亂，他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那就是：若中國人不能獲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備充分的知識，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①。沒有現代知識的傳播，沒有更廣泛的對變革要求的覺醒，中國無法面對現代世界的挑戰。在張元濟看來，任何政治改革強加於冷漠、毫無生氣和愚昧無知的羣衆，必然毫無結果。此外，他對保守派的勢力和頑固性也十分瞭解，知道會阻擋任何急劇的改革。爲了貫徹文化救國的主張，唯一可行之路就是改革教育，然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他必須另有所擇。張元濟後來加入商務印書館，使它成爲現代中國最大的出版社。當把出版變爲終身事業時，他實際上還是實行同一個目標——傳播現代思想和啟迪民智。這時候，他失去官方的支持或光緒的庇蔭，卻與一個工人出身的小印刷所老闆夏瑞芳（1872—1914）緊密合作。夏瑞芳的文化水平低，卻有機敏的商業頭腦和取勝的決心，使他在上海的民族實業界獲得一席之地。張元濟與夏瑞芳畢生合作，共同發展商務印書館事業，是士大夫與出身工人的資本家合作共事的鮮見例子。張元濟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遠見、非墨守成規和開明的學者，他一方面緊緊地恪守儒家的基本道德信條，另一方面卻並非僵化、保守到一見新思想、新哲學就馬上抵制。他雖身爲翰林，卻從不會看不起學識和資歷較淺的人。在那個時代，張元濟被廣泛公認爲藏書家和古籍版本目錄學家，對善本書的追求是頗帶傳奇色彩的。他於1919年就開始全力支持新文化運動。在他直接影響下，民國最初的十年間，商

務印書館成爲不同觀點的學者都可以愉快合作的場所——頗似衆所周知在蔡元培任內（1917—1919）北京大學的局面。張元濟爲歐美、日本的留學生敞開大門，聘請他們爲商務工作，而不是招募舊式學者或與他有相似背景的好友。從中國新式學校畢業的年輕學生也同樣受到歡迎，並按工作成績給予晉升，於是在商務的編輯中出現陳獨秀、茅盾和鄭振鐸的名字就不足爲怪了。

張元濟企圖通過文化手段使中國走向現代化，這個想法是士大夫階層所共有的，從清朝末年大量湧現的民間報紙、新式學校和略具政治性質的團體中可以看到。作爲讀書人，很自然會企圖通過傳播各種知識以救中國。因此，張元濟一生的目標和走過的路是很有代表性的。

然而，張元濟比同輩更傑出，是因爲作爲一個現代企業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少傳統學者出版報紙雜誌，或書籍小冊子，介紹新知識或新哲學，但往往壽命不長，影響有限。張元濟跟他們的區別在於：他把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家庭式印刷所改變成爲現代中國最主要的出版社。誠然商務的發跡史還有其他因素，但他的遠見、能力和指導足以表明是一個有極強創造力的企業家。在他以前，中國還沒有那樣規模的印刷工業。

1898年，當張元濟還是京官的時候，對工業化和發展商業已有興趣。大家知道，在學者的一生中，經商沒有甚麼地位。但是，在給光緒的長篇奏摺中，張元濟不僅竭力爲民族實業家和商人的權利辯護，而且指出在與西方競爭的貿易戰中，民族企業應被看作國力的基石而予以大力保護。儘管強調民族企業作爲抵制西方經濟滲透與商業擴張的手段這個課題並非始自張

元濟^②，然而他熱情地為經濟現代化呼籲和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控訴，卻表明了對民族工業化的興趣和理解。由此可以看出，張元濟把商務印書館當作終身事業並不僅僅是由於出版業是一種“文人的職業”，當然，他十分關注出版物，有了那些書刊雜誌，就可以影響輿論並傳播知識，況且他是有文化素養的，但同樣關注作為一個企業的正常經營。現存的資料可以證明張元濟要將商務發展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由受過企業管理和現代會計專門訓練的人員來經營。因此，他堅持領導人、高級職員的子女和至親不應進入商務任職，是他率先勸阻自己的兒子進公司，“新式企業不應傳代”。^③這種反對裙帶風的堅定態度，直接針對中國企業界由來已久的傳統做法，但也使他在領導層中得罪了不少人。^④他使商務在1906年成為股份有限公司，並在新設立的商部註冊。

張元濟的信件和日記一樣，記載了大量關於制訂促進銷售的辦法、購買新式機器和選送年輕技術人員出洋學習先進技術的事例。^⑤他深入企業經營的每個環節，他對企業的成就產生自豪感。

張元濟一開始便是講求實際的人，重實幹而非空談，因而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低調的。他不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只有一次曾直接參與政治活動是清末戊戌變法。在曇花一現的變法初期曾受到光緒皇帝召見，這是他能影響最高決策層的“近日點”。然而他並不是一個為了替變革辯護而重新解釋儒家哲學的精神領袖。儘管他在恪守傳統倫理道德時絕不狹隘保守，但沒有試圖像康有為、譚嗣同那樣提出一種完整和有系統的激進思想，也沒有為推理出一套現代化的理論基礎而費

煞苦心。對他來說，變革和現代化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他是達爾文“適者生存”學說的信徒——這正是他好友嚴復所大力宣傳的學說。爲了生存，中國需要劇烈的變革，這是無可辯駁的。他很少爲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作任何解釋。當康有爲宣稱在廣州創辦學堂是爲中國培養現代化人才；梁啟超在雄辯的社論和隨筆中再三聲言他的報紙是以現代思想喚醒民智的時候，張元濟在參加商務印書館時，卻沒有留下任何公開的記錄以說明同樣的崇高目的和意圖。與此相似，幾十年以後，王雲五提出了數萬言詳細材料，說明他爲甚麼和怎樣選擇了追隨蔣介石政府的道路，而張元濟卻沒有直接聲明或公開闡述他留在中國的決定。

當然，留下大量著作的人往往會引起後來歷史學家的注意。他們在某一時期中所起的作用，於當時發表的文章或長篇自傳式的回憶錄都得以闡明。此外，這些知名度較高的人物往往培養一些忠實的門生，他們能撰寫關於先師生平和哲學的大量回憶文章、年譜和論文。相比之下，張元濟留下的材料卻是貧乏和不易爲人所理解的。但這不應該成爲研究他生平和事業的障礙。舉例來說，儘管在他所編纂的書籍撰寫大量的序跋中，沒有公開強調個人的作用或目的；在董事會的演說中也從不奢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然而仔細分析商務印書館各個不同時期出版的書籍和刊物，其出版方針的輪廓是清晰可見。張元濟對出版方針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可以從考察當時的決策機構和決策過程來作出評價。

此外，尚有不少私人的手稿，主要是文章和詩篇。許多文章寫於晚清，其中包括上光緒建議變法的奏摺和上慶親王的手

摺，還有不少是為剛設立不久的學部提出的詳細計劃。其餘文章寫於三十年代後期，有社會政治的主題，其中一些曾刊載於商務最重要的雜誌——《東方雜誌》。

張元濟還留下幾百首詩，這些詩並非文學家追求文字、音韻上的盡善盡美的作品，而是為表達自己對一系列事件的情感和思想所作，許多是對國內外時局的評論。有一些曾在他的密友間流傳。除了少數之外，他的詩作並不公开发表。

研究張元濟的最好資料來源，是他寫給友人和同事的大量信件，數量多達千餘封，這些信件並無公諸於眾的意圖，然而作為第一手材料，卻有更高的價值。雖然他的信絕大多數是簡潔的、並不動人的和業務性的，然而卻揭示了他的內心世界。這比任何按事後的想法寫出來的自傳更有力和真實地解釋了他一生中的許多“怎樣”和“為甚麼”。

張元濟有工作日記，其中重要的部份保存至今。它與大多數文人的日記全然不同，看上去好像是一部航海日誌。日記的內容是記載他任商務經理時，每天收發郵件的詳細記錄，以及處理各項事務和協議的瑣事。

通過收集張元濟親筆書寫的各種資料，把它們與他知名的友人和同時代人物的年譜作仔細比較，對照關於他或商務印書館的回憶錄和原始史料，再把這一切放在已知的、有文獻記載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史實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對張元濟的生平和事業的研究就有了十分充實和豐富的原材料。

像張元濟這樣人物的生平和事業是值得研究的，由於他既是那一羣體中的代表者，而且在追求理想時，又比一般人更能貫徹始終。我確信這事實後，便開始為這位鮮為人知而又傑出

的人物撰寫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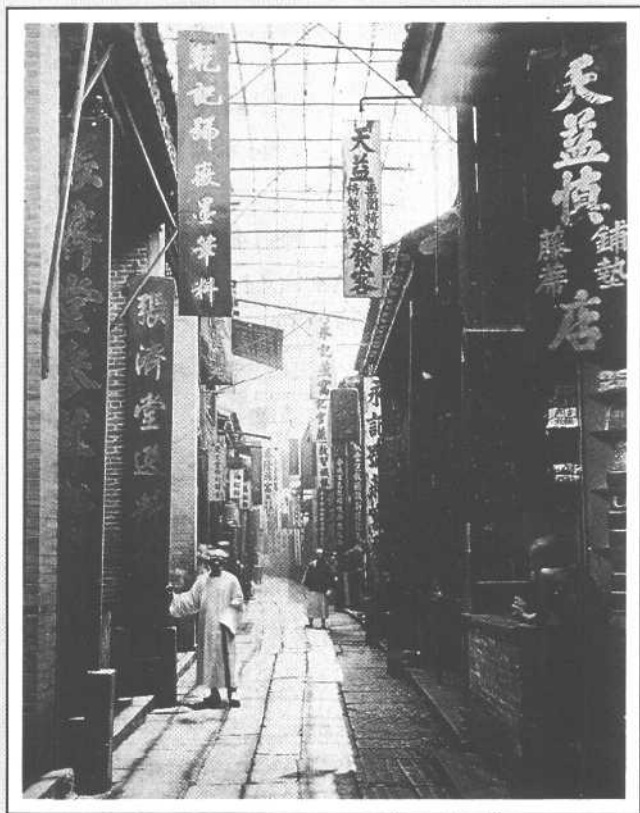
希望透過研究像張元濟這樣的人物，會更充分和全面理解現代中國重要轉折時期的歷史。

註 釋

- ①作終身對文化現代化的信念可見諸於不同時期的書信。例如1896年致汪康年函，1913年致熊希齡函，1937年致張伯苓函等。《張元濟書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9，63，161，165。
- ②把民族企業作為現代化的手段的早期倡導者是鄭觀應、何啟、王韜。他們被稱為“紳士買辦”，並具有濃厚西方化的背景。
- ③張樹年：“我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北京商務印書館內部刊物），第6卷（1981年），頁2—4。
- ④《張元濟書札》，頁190—192，頁195。
- ⑤同上，頁184—194。

第一章

早年在廣東和浙江的生活



十九世紀後期之廣州市街

早年在廣東和浙江的生活

張元濟在1867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省^①。張氏祖籍是浙江省海鹽縣，以豐富的學識和科舉考試的成就而遠近聞名。張氏家族的聲望可以上溯至明代，其時張氏數位先人在科舉考試中獲得卓著成績，因而授與較高的官職。然而，張氏家族更以收藏珍本古籍而著稱。他們大多樂於較早地從官場退休，以便投身於古籍的校勘。張氏家族的私人藏書處“涉園”始於1660年，收藏珍本書籍和手稿。經過幾代人的經營，到十九世紀時，其收藏之精，吸引不少著名學者和研究者前往借閱，並以涉園的藏書作為校勘的樣書。

藏書處及其別具一格的花園，成為學者、詩人聚會的勝地。張氏總是在這種風雅的文人聚會上擔任主人的角色。然而太平天國起義給南方帶來很大的破壞，在浙江尤甚。浙江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並且是科舉應試者取得功名最多的一省，傳統的經典教學十分普及，且以私人藏書著稱。戰爭期間，不少藏書樓均遭焚毀，也打亂浙江上層家庭青年的生活模式。接連不斷的戰爭意味着寧靜的、為功名苦讀詩書的生

活難以爲繼。張氏的涉園也是在這時候被毀。張元濟一生中，耗費很多時間與力量試圖重新收集涉園散佚的書籍。張元濟的父親，一個有抱負的年輕學者，也在這時逃離家鄉。他南下廣東，並在那裏落了戶。張元濟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已成為這個南方邊遠省份的官員。張元濟的童年便在廣東平淡地度過，大部份時間用於學習傳統的經典、歷史和詩詞，他同其他士大夫的子弟一樣，忙於這流傳千年的舉業——通過科舉考試這一“天職”。十九世紀末，這種考試仍然是年輕人獲得成功的主要途徑。國家的英才仍然把學習經典和歷史作爲有效地統治中國的根本途徑，作爲一個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場悲劇，因爲面對具有侵略性的西方國家，精通儒家經典的學人卻成了無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對於這些學人本身來說，也同樣是悲劇。

西方列強對通商權的要求、強大的軍事力量及完全不同的國際關係概念，使中國難於應戰。不管學者多麼刻苦地鑽研孔子哲學——它本質上是封閉、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的產物——而最終卻是徒勞的。

張元濟生於廣東，直到十三歲才返回浙江。②他會說流利的廣東話，後來在他的一生中，與廣東籍的政界、商界人士均有很好的交往。在這形成自己品性的年歲裏，他生活在中國南方這個省份，而西方的影響已在香港、廣州一帶逐漸加深，這也很可能是促使他後來的思想變得頗具近代意識的原因之一。在十九世紀中葉（此時張元濟在廣東），中國曾兩次被西方列強打敗，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並有爲數不少的西洋人出現在中國。同時，一些具有直接與西方侵略者打交道經驗的中國學者和官吏，開始提出有限度的變革。當時，“自強”的口號